

西部人才开发的基础 是提高民族教育的质量

钱民辉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国家发展重点战略西移。众所周知，加快西部的发展，这不仅是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使各地区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西部经济的起飞，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但是，对西部来说，在这次极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选择西部的发展道路，国家的战略构想就不能有效地实现。

从“水平——速度”看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有四个阶段或模式，即“低——慢”、“低——快”、“高——快”、“高——慢”阶段。过去，西部与东部相比，明显的是处在前两个发展阶段中。这次西部大开发战略，显然是要选择“高——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因为，根据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要求，应着眼于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未来趋势，从更高的视角、更具前瞻性的制高点，总体关照中西部的未来。因此，这次西部大开发首先考虑的是在大西北布设最前沿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生物、现代医药、航空航天、新型复合材料、信息及通讯工程等。由此看来，西部开发重点将是高科技产业化的结构布局，因此开发西部的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也就是将教育发展放到了西部开发战略的重要位置上。为了能使教育发展满足西部地区开发对人才的需求以及人才的可持续开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一、西部人才开发的高起点与 民族基础教育质量低下的关系

以科技为先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无疑将人才引进与



置，这样必然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期望，同时也为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西部地区是我国多种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之间较为封闭性的特点，经济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由于长年教育经费短缺，师资匮乏等问题突出，严重地影响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从目前来看，西部开发战略将人才开发起点提得很高，特别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实现“科教兴西”的战略。但是，从长远来看，西部人才开发的源泉是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质量，进而会影响到西部地区开发战略的有效实现。

从西部人才战略构想来看，应当说明的是，人才引进与人才开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才引进具有短效性，是一种“治标”行为；人才开发具有长效性，是一种“治本”行为。从外面引进人才和内部开发人才相结合才是“治标治本”的合理策略。从近期的口号看，西部开发明确地提出了重点开发西部高科技人才战略构想，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学进行扩招，实现西部人才的规模开发与利用。这种人才开发的高起点是适应高科技龙头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点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在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低下，短期内不可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而高等教育则迅速起飞，长期下去势必影响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质量。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科技人才也并非都是高等教育的产物，中等教育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东部各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应是中等教育普及的结果，客观地说，我们相信高等教育的普及必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但是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找到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这就是说，教育发展一定要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那么，既然如此，当前西部人才开发的起点应当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我认为，应当注重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尽快提高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质量，大力发展面向科技产业的，既有民族特点又能适应西部经济开发需要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有计划地发展高等教育。将人才开发的目光视野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依靠引进到依靠开发，从短期放到长远，只有这样，西部的人才开发才能为西部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二、人才引进与人才发挥作用的環境的关系

以“科技为先导”的西部开发，目前最需要的是科技人才。最近几年西部



地区为引进科技人才，发挥人才的规模效益，不断地加大了吸引力度。从政策上明文规定，提高被引进人才的物质待遇和生活水平，将职称问题和出国深造落到实处；尽管如此，引进一个高科技人才仍是一件难事，更难以形成人才规模优势。就是自己培养的人才又常常是“孔雀东南飞”。去年，笔者到西部两地八所大学、科研单位和一些企业作过调查，在为数不多的几所重点大学里，由于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和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植，以及学校为教学科研骨干提供了最好的工作环境，因此稳定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骨干，形成了学术上的规模优势，使一些专业和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是大多数的普通大学和一般的科研机构，由于条件限制，人才引进困难不说，现有的人才还是不断地外流。如果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一些大企业中，尽管科技人才有着较高的经济报酬，但也无法避免科技人才的流失。一条主要的原因是，企业不能提供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环境和发展的机会。如此看来，西部在人才引进上，除了在物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政策外，一定还要改善科技人才发挥作用的各种条件和环境。

三、可持续发展应当纳入 民族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中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西部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一个是自然生态与环境资源方面的，另一个是人文环境与文化多样性方面的。西部开发必然与这两个方面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且，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矛盾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必然会引起生态的和环境的问题。从自然环境看，我们知道，西部地势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我国水资源的发源地。而且，西部地区空气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全国广大地区，只要西北风一吹，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立即好转。由此可见，保护西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西部开发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并举；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无环境污染产业是必由之路。从人文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看，西部经济大开发一定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像保护环境资源一样对待光辉灿烂的西部历史文化，使后人能够从这些文化遗产中了解到我国西部民族曾有过的文明历史。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密集的地区，因此，西部开发一定要注意文化的多样性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问题，发展适合少数民族文化和经济特点的又能与未来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民族经济高新产



业。

在我们的基础教育课本中，我们一直以中国有 56 个民族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感到自豪，地大物博掩盖了资源的有限性，使我们觉得资源是用不完的。当学生从小有了这种观念后，长大以后是很难改变的，对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只能成为空谈。我们在西部考察时，当看到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河流受到污染，出现严重的缺水和雪线上升等环境问题时，当地人并不认为是由于他们乱垦乱伐、过度放牧、盲目开采矿业造成的，而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过几年自然又好了。他们的生存就是靠天吃饭，习惯了这种自然变化的情况。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靠天吃饭的生存地正在变小，环境恶化引起土地大量的沙化，也许用不了多少年，他们将无法迁徙到可以继续靠天吃饭的地方。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前提是，让每一个西部人都懂得，西部的资源是丰富的，但不加保护随意开采是会枯竭的。因此，我们建议，将环境的、资源的、人口的、教育的、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到中小学课本中去，让他们不但懂得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也要学会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

四、不应忽视西部高等教育扩招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西部大开发的高科技定位，使西部地区开始向知识经济的社会迈进。高等教育为了适应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必然从传统的精英的传授式大学教育模式转变为现代的大众化的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而要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是，需要在理论上建立和提供一套能够说明实现这一转变的充分的和必要的依据。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教育经济学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采用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方法，从高等教育系统走外延式发展还是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①，以及高等教育系统扩展所带来的内部效益和外部效益两个层面^②，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框架。这种分析有效地预测了高等教育内部规模扩展（也称高校扩招，是一种内涵式发展）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教育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可以信赖的理论依据，使今年的高校扩招成为可能，奠定了中国高

① 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教育研究》1990年第10期。

② 闵维方、丁小浩，“对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化的基础。但是教育经济学的量化分析过分注重了“规模与效益”的经济效果，而忽视了社会效果。换个说法，如果高等教育扩大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至少到现在来看，促进经济增长还是中等教育普及的结果。有的教育经济学家也提出，高校扩招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有限的^①。将来，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还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是因为经济效益或经济增长还要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问题，这将成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然而社会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问题，以及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由此而引起的社会效果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效益，也许是今后流行的一个趋势。

如何从社会学的视野看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效益，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社会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泛的视野和分析架构。在针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提出一种功能方法时，反功能的概念是非常有用的。反功能的后果是减少系统的适应能力，并且最终导致系统明显的紧张和瓦解。要建立补偿机构来中和或消除反功能的后果。这实质上就意味着结构的变迁。这些新建立的结构可能逐渐产生它们自身的反功能后果，这就会刺激另外的结构变迁，以此类推。

当把功能后果和反功能后果之间的区别与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区别结合起来的时候，功能后果和反功能后果间的区别就可以获得最有效的应用。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其中某些显功能或某些种类的行动路线或制度性结构的明显目的是要有利于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或它自身。除去这些显功能外（实际上可能是有意完成的），常常有没预料到的反功能的副作用，这些作用对同一个系统或对别的系统则是反功能的^②。

根据上述理论命题，对高等教育的扩展我们可以用一分为四的观点来分析，即用“正功能和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十字相交构成的四个维度来说明高等教育扩展的社会后果和未来的效用。其目的是为教育决策部门和研究人員提供一种较为全面、长远、客观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第一个维度是“显——正功能”。正是从外显的、积极的功能研究高校扩

^① 北京大学课题组，“如何看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消息报》（成都），1999年8月6日（3）。

^② D. P. 约翰逊著，《社会学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55—558页。



招，给决策部门提供了信心支持，使决策成为可能。从各种媒体中我们不难找到这类的信息，诸如，高校扩招可以适当地解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与高等教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高校扩招将会拉动经济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需要，许多学者从这一维度出发，采用定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高校扩招，许多研究成果都准确地预测到某一时期内将由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但是，我们却无法从这种乐观的景象中预见到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后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独立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正是对高等教育扩展所带来的持续性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对反功能效果估计不足，因此，由高等教育扩展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在80年代爆发出来，使高等教育处在危机中^①。

第二个维度是“显——反功能”。这种分析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而是一种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分析。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诸如，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容纳”趋于紧张，于是出现了许多“床铺生”与“非床铺生”；教师、教室与教学设备紧张，导致教学质量滑坡，这种例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独立后的一些非洲国家已有先例；再说，一名大学生的成长，深深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使其人格与行为上都具有校园文化的特征。但是，校园文化功能无法辐射“非床铺生”。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由于高校扩招，使正在发展中的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将高考的压力推向了中考，使中小学生的课业减负难以进行，如此等等，这种“显——反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在决策中，如果对这一维度估计不足，就会带来许多问题。研究“显——反功能”就是为了处理好或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增强正功能的效果。

第三个维度是“潜——反功能”。在任何一项决策中，都不应忽视了对这一维度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因为这一维度的反功能效果具有隐蔽性和延迟爆发性。诸如，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校扩招如果不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状况，就会加剧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场所的紧张；在学位贬值的情况下，会出现有“学位的失业者”和工作场所“依次降格使用人才”的现象，于是，大学毕业生竞相攻读更高的学位以获得找到好工作的资格等等，导致过度教育与教育投资的浪费。这种潜反功能的研究是根据现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差做出的一种推

^① 钱民辉编译，“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危机——焦点、问题、策略与改革”，《外国教育资料》（沪）1994年第6期。



测。

第四个维度是“潜——正功能”。这是从潜在的、预期的和积极的方面看待高校扩招。对这一维度的研究将有利于增强“显——正功能”的效果，许多的教育决策中都没有忽视对这一维度的研究。诸如，高校扩招将有利于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现；有利于进一步扩展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人才合理的社会流动；提高高校内部经济效益，提高高校教师的生活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减轻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压力。这种潜正功能的研究将有一种预期的效果。

上述四个维度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框架，西部高等教育的扩招应当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基础上，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应当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与需要相适应，从追求数量化走向以追求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西部人才开发与经济腾飞指日可待。

作者简介

钱民辉，男，1956年出生于北京，1996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获得教育社会学方向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留校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研究方向是“教育社会学”，研究范围涉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育与社会分层”、“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城乡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教育”及“女性文化学”。1996年以来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教育研究》、《民族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三部学术专著：《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学生实话实说》、《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并主编和参编多部论著。199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两门选修课程：《教育社会学专题讲座》及《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为本科生开设《教育社会学》基础课程。

